

生育研究

2006 ~ 2016 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

——基于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贺丹 张许颖 庄亚儿 王志理 杨胜慧

【内容摘要】文章使用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 对全国生育水平、生育意愿、避孕方法及生育养育服务等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2006 ~ 2016 年, 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上升 2.7、2.6 岁。2006 ~ 2011 年总和生育率大致在 1.60 ~ 1.70 之间, 2012 ~ 2016 年波动较大, 2012 和 2016 年总和生育率是近期的高点。与 2006 和 2011 年相比, 2016 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分布曲线明显右移。受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影响, 2012 年以来, 二孩占出生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 一孩则相反。2011 年以来, 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 1.96 和 1.75 个。已婚有偶育龄妇女避孕率为 84.7%。3 ~ 5 岁幼儿入园率为 80.8%。在公立与私立机构的比例分别为 34.9% 和 65.1%。最后, 文章在总结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对促进按政策生育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生育水平; 生育意愿; 避孕方法; 生育养育服务

【作者简介】贺丹、张许颖、庄亚儿,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志理、杨胜慧(通讯作者),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 100081

China Fertility Status Report, 2006 – 2016: An Analysis Based on 2017 China Fertility Survey

He Dan Zhang Xuying Zhuang Yaer Wang Zhili Yang Shenghui

Abstract: Based on 2017 China Fertility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ional fertility level, fertility intentions, contraceptive use, and childbearing and parenting servi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06 to 2016, the mean ages at first marriage and first birth increased by 2.7 and 2.6 years, respectively.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between 2006 and 2011 was between 1.60 – 1.70 and fluctuated between 2012 and 2016, peaking in the years of 2012 and 2016. Compared with the curves of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 in 2006 and 2011, the one in 2016 shif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right. Affected by the selective two-child policy and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the proportion of second parity has increased since 2012, while the trend is opposite for the proportion of first parity. Since 2011, the sex ratio at birth has declined slightly. For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s, th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is 1.96, while the intended number of children is 1.75. The rate of contraceptive use of currently married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s is 84.7%. About 80.8% of children aged 3 – 5 are enrolled in the kindergarten, 34.9% are in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65.1% in private institutions. The future trend of Chinese fertility is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Fertility Level, Fertility Intentions, Contraceptive Methods, Childbearing and Parenting Services

Authors: He Dan, Zhang Xuying and Zhuang Yaer are Research Fellow; Wang Zhili and Yang Shenghui are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Email: yang-shenghui@ruc.edu.cn

^{*} 参加写作的还包括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姜玉、赵雪晴、齐嘉楠、韩枫。

1 引言

1982~2006年,原国家计生委(后为国家人口计生委)先后进行过6次以生育为主题的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综合调查^①,所收集的数据为了解我国生育状况的变化趋势及政策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2006年之后,大约每5年1次的抽样调查未能延续。2000年以来有关生育的研究主要依靠全国人口普查、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相关部委统计数据等资料。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在生育转变完成后出现了极低生育率。随着时间推移,更多国家(地区)步入极低生育水平行列,除了欧洲,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先后加入(靳永爱,2014)。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和2005、201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得出的生育水平也引起了我国学者、政府和公众的担忧与争论。郭志刚(2010、2015)提醒注意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风险。这一时期,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有学者得出2000~201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5(郝娟、邱长溶,2011);有学者根据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得到我国2000~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50~1.64之间(崔红艳等,2013);杨凡、赵梦晗(2013)利用其他来源的数据对普查数据进行了校验,估算200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约在1.6~1.7左右。陈卫(2016)根据普查数据,利用相关模型对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认为我国近期的生育水平不低于1.5,而近年来在1.6左右,且有上升趋势。这种差异既有认识和思维逻辑的原因,也有使用不同数据和方法的原因(陈卫,2016)。

随着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相继实施,我国的生育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生育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单位制为基础的托育服务及其体系解体,主要是女性承担了婴幼儿照料,使得女性在职业发展和子女养育上处于两难境地(杨菊华,2018)。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各地完善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加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和提高妇幼健康服务水平,强化技术保障措施。在此背景下,开展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是为把握近年生育水平变动态势,了解群众生育意愿、生育养育相关公共服务落实情况,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提供科学依据。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了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

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目标总体为:2017年7月1日零时现住中国大陆的15~60岁中国籍女性人口。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生育行为、生育意愿、避孕方法及生育养育服务共4个方面。设计样本量为25万,采用分层、三阶段、概率比例抽样(PPS)方法抽取样本,实际成功调查249946名。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API)在问卷设计、人员培训、末端抽样和样本替换、入户访问、问卷审核等全流程质量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结束后进行的事后质量抽查以及将调查个案数据与人口和计划生育数据资源库中相关行政记录所进行的比对和核查,证明了本次调查获取的出生数据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为了克服由于抽样框的缺陷所产生的样本结构偏性,在数据处理阶段根据相关数据对样本数据进行了事后加权(庄亚儿等,2018)。本文利用加权后的调查数据,对全国近期生育状况进行了分析。

2 妇女婚育状况

2.1 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

调查显示,2006~2016年我国20~34岁女性已婚比例呈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75.0%下降到2016年的67.3%。城乡妇女的已婚比例存在明显差异,20岁时,城镇为1.4%,农村为8.6%;25岁时,城镇为30.5%,农村为66.2%;30岁时,城镇为82.0%,农村为94.6%。

^① 6次调查依次为: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信息系统首次调查、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和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

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呈明显上升趋势。全国从 2006 年的 23.6 岁上升到 2016 年的 26.3 岁,其中,城镇从 24.6 岁上升到 26.9 岁,农村从 22.8 岁上升到 25.6 岁(见表 1)。妇女已婚比例的下降以及平均初婚年龄的上升对生育率的影响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表 1 2006~2016 年分城乡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Table 1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of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by Urban and Rural Areas, 2006–2016

年份	全国(岁)	城镇(岁)	农村(岁)
2006	23.6	24.6	22.8
2007	23.5	24.5	22.7
2008	23.8	24.7	23.0
2009	23.9	25.0	23.0
2010	24.0	24.9	23.3
2011	24.2	25.2	23.4
2012	24.8	25.6	23.9
2013	25.1	25.9	24.3
2014	25.6	26.2	24.9
2015	25.9	26.5	25.3
2016	26.3	26.9	25.6

资料来源: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

2.2 2006~2016 年的总和生育率在 1.65 上下波动, 二孩生育率明显上升

2006~2016 年的总和生育率在 1.65 上下波动。其中, 受生肖效应影响, 2012 年(龙年)生育水平较高, 为 1.78, 2015 年(羊年)生育水平较低, 为 1.41。受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 2014 和 2016 年生育水平都比政策实施的前一个年份有所提高, 分别为 1.67 和 1.77(见表 2)。

表 2 2006~2016 年分城乡总和生育率

Table 2 Total Fertility Rate by Urban and Rural Areas, 2006–2016

年份	全国	城镇	农村
2006	1.62	1.21	1.98
2007	1.69	1.31	2.02
2008	1.71	1.26	2.12
2009	1.68	1.27	2.06
2010	1.64	1.27	1.99
2011	1.61	1.24	1.97
2012	1.78	1.45	2.12
2013	1.55	1.21	1.92
2014	1.67	1.37	1.99
2015	1.41	1.16	1.69
2016	1.77	1.54	2.05

资料来源: 同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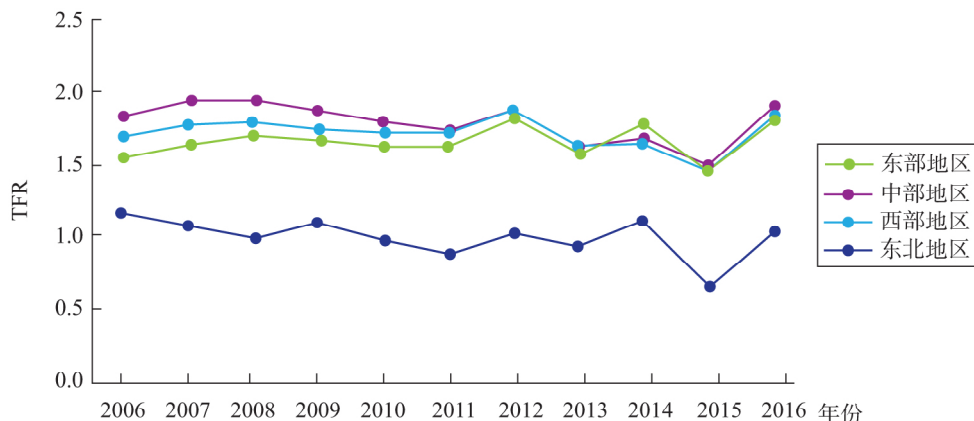
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对城乡和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2014 年城镇和农村总和生育

率分别为 1.37 和 1.99,比 2013 年分别提高 0.16 和 0.07;2016 年城镇和农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54 和 2.05,比 2014 年分别提高 0.17 和 0.06。可见,城镇妇女受生育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同区域妇女生育水平差异较为明显。2006~2015 年,各区域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均呈下降的趋势,地区差异较为明显。2006 年总和生育率最高的中部地区比最低的东北地区高 0.67。2016 年受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影响有所回升,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79、1.90、1.83 和 1.04,最高的中部地区比最低的东北地区高 0.86(见图 1)。

图 1 2006~2016 年分区域总和生育率

Figure 1 Total Fertility Rate by Region, 2006-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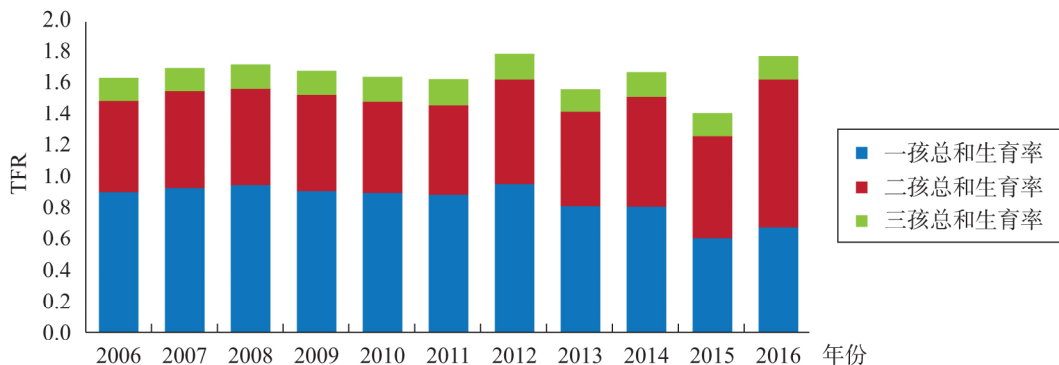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同表 1。

数据显示,一孩总和生育率从 2011 年的 0.88 下降到 2016 年的 0.67,二孩总和生育率从 0.57 上升到 0.94,三孩及以上的总和生育率变动不大,在 0.15 左右波动(见图 2)。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升高使得总和生育率上升。

图 2 2006~2016 年分孩次总和生育率

Figure 2 Total Fertility Rate by Parity, 2006-2016



资料来源: 同表 1。

表 3 为 35~60 岁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分布,表现为随年龄的增大而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 45 岁作为完成生育的年龄,那么在 45~60 岁的 16 个年龄组当中,仅有 54~60 岁这 7 个年龄组达到或接近更替水平,而其余的 9 个年龄组则低于或明显低于更替水平。60 岁和 50 岁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分别为 2.12 和 1.85 个。

表 3 35~60 岁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

Table 3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to Women Aged 35-60

妇女年龄(岁)	平均曾生子女数(个)	样本规模(人)	妇女年龄(岁)	平均曾生子女数(个)	样本规模(人)
35	1.58	6088	48	1.74	7500
36	1.63	4997	49	1.81	6795
37	1.65	5236	50	1.85	5954
38	1.62	5412	51	1.87	6424
39	1.66	5291	52	1.90	6303
40	1.65	4908	53	1.92	6431
41	1.66	5133	54	2.00	7085
42	1.65	5683	55	2.08	5428
43	1.67	6150	56	1.99	3876
44	1.69	6680	57	2.00	4503
45	1.68	6377	58	2.05	4116
46	1.68	7011	59	2.06	4648
47	1.72	7133	60	2.12	2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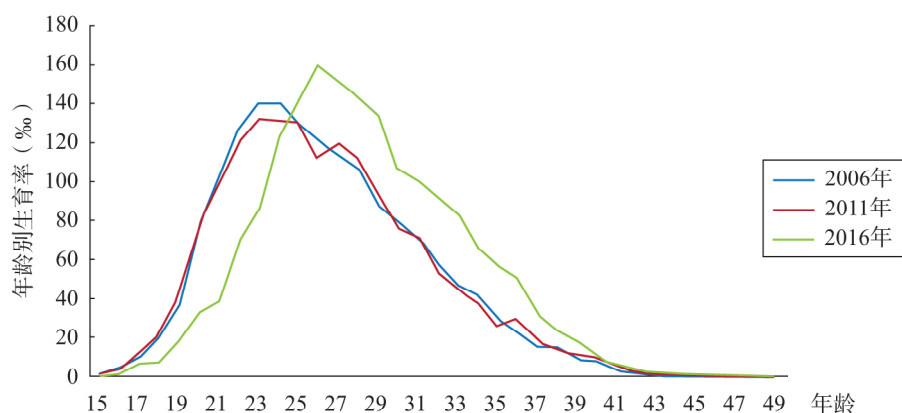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同表 1。

2.3 生育峰值上升, 峰值年龄右移

在 2006~2016 年的 11 个年份中, 按照等距原则选取了 3 个年份, 即 2006、2011 和 2016 年, 将这 3 个年份的年龄别生育率分布进行比较。既兼顾了对变化趋势的分析, 同时也能够反映出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图 3 为上述 3 个年份年龄别生育率分布曲线。与 2006 和 2011 年相比, 2016 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分布曲线表现出明显的右移。2006 和 2011 年的生育峰值年龄均为 23 岁, 2016 年提高到 26 岁。2006 和 2011 年生育峰值年龄生育率分别为 139‰ 和 132‰, 2016 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为 160‰。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 2006 和 2011 年, 2016 年低年龄组生育水平下降, 生育推迟带来累计年龄别生育率下降, 但受全面两孩政策影响, 较高年龄组补偿生育则明显上升, 政策效应带来累计年龄别生育率上升。

图 3 2006、2011 和 2016 年年龄别生育率

Figure 3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 2006, 2011 and 2016



资料来源: 同表 1。

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从 2006 年的 24.3 岁上升到 2016 年的 26.9 岁; 二孩平均生育年龄从 2014 年的 29.2 岁上升到 2016 年的 30.2 岁, 这是政策调整后较大年龄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引起的; 三孩及以上平均生育年龄无明显变化(见表 4)。

表 4 2006 ~ 2016 年分孩次平均生育年龄

Table 4 Mean Age at Birth by Parity , 2006 - 2016

年份	初育(岁)	二孩(岁)	三孩及以上(岁)
2006	24. 3	30. 0	31. 9
2007	24. 4	29. 9	31. 9
2008	24. 4	29. 6	32. 2
2009	24. 4	29. 5	32. 1
2010	24. 6	29. 2	31. 8
2011	24. 7	29. 1	31. 8
2012	25. 2	29. 0	31. 6
2013	25. 5	29. 0	31. 3
2014	26. 1	29. 2	31. 4
2015	26. 5	29. 4	31. 2
2016	26. 9	30. 2	31. 4

资料来源: 同表 1。

2. 4 二孩比例上升 , 一孩比例下降

表 5 是 2006 ~ 2016 年出生人口的孩次构成变化情况。数据显示 2006 ~ 2016 年出生的孩子中 , 一孩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 二孩的比例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 三孩及以上的占比在 10% 左右小幅波动。2012 年以来 , 二孩与一孩的比例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 , 二孩比例逐年上升 , 一孩比例逐年下降。二孩出生增加缓解了由于一孩出生趋势性下降带来的出生人口下行的压力 , 也意味着一孩家庭比例下降 , 对优化家庭结构、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表 5 2006 ~ 2016 年出生人口的孩次构成情况

Table 5 Parity Distribution 2006 - 2016

年份	一孩占比(%)	二孩占比(%)	三孩及以上占比(%)
2006	54. 7	36. 1	9. 2
2007	54. 7	36. 4	8. 9
2008	55. 5	35. 2	9. 2
2009	55. 1	35. 5	9. 3
2010	55. 8	35. 0	9. 1
2011	55. 8	34. 8	9. 4
2012	54. 4	36. 5	9. 1
2013	52. 0	38. 2	9. 8
2014	48. 3	41. 9	9. 8
2015	43. 1	46. 1	10. 8
2016	37. 0	53. 9	9. 0

资料来源: 同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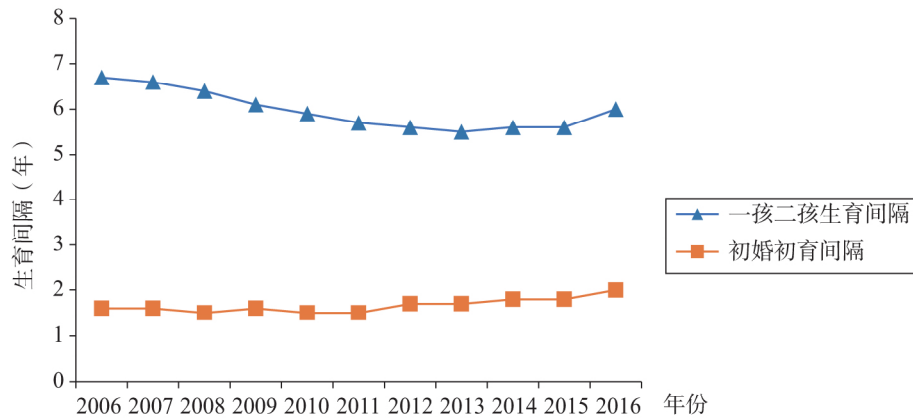
2. 5 2016 年的婚育间隔和一孩二孩生育间隔均有所扩大

2006 ~ 2016 年 , 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呈现不同幅度的上升 , 初婚初育间隔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 从 2006 年的 1. 6 年缩小到 2010 年的 1. 5 年 , 2016 年扩大为 2. 0 年。

通过对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和二孩平均生育年龄的比较,发现一孩与二孩的生育间隔从 2006 年的 6.7 年缩小到 2010 年的 5.9 年,2011~2015 年在 5.5~5.7 年之间小幅波动,2016 年扩大为 6.0 年(见图 4)。

图 4 2006~2016 年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和一孩二孩生育间隔

Table 4 Intervals between First Marriage and First Birth and Second Birth Intervals of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2006-2016



资料来源: 同表 1。

2.6 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

2011~2013 年出生性别比为 114.9, 明显超出正常范围(103~107)。2014~2015 年下降至 112.4。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 出生性别比继续有所下降, 2016 年下降至 111.6(见表 6)。分孩次来看, 二孩出生性别比的下降更为明显, 由 2014~2015 年的 116.0 下降到 2016 年的 109.8。

表 6 2011~2016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

Table 6 Sex Ratio at Birth 2011-2016

年份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所有孩次	
	性别比 (女=100)	样本规模 (人)	性别比 (女=100)	样本规模 (人)	性别比 (女=100)	样本规模 (人)	性别比 (女=100)	样本规模 (人)
总计	104.8	24119	116.4	23000	150.7	4795	113.3	51914
2011~2013	104.2	15750	123.1	10204	160.5	2577	114.9	28531
2014~2015	103.2	8311	116.0	7602	148.5	1723	112.4	17636
2016	108.7	3835	109.8	5452	139.8	880	111.6	10167

资料来源: 同表 1。

3 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3.1 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96 个

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96 个。在不受任何外界条件影响下, 11.4% 的育龄妇女认为 1 个孩子最理想, 80% 认为 2 个最理想, 7.9% 认为 3 个及以上最理想, 0.7% 认为没有孩子最好。在理想子女数为 1 孩的育龄妇女中, 理想性别为女孩的比例高于男孩, 分别为 53.1% 和 40.4%, 认为男孩女孩无所谓的占 6.5%; 在理想子女数为 2 个的育龄妇女中, 92% 认为“一男一女”最理想。按年龄划分, 年龄越大, 理想子女数越多, 15~19 岁的育龄妇女平均为 1.86 个, 45~49 岁最高, 为 2.07 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分别为 2.02 和 1.83 个。

3.2 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75 个

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75 个。31.9% 的育龄妇女打算生育 1 个孩子, 56.6% 打算生育 2 个, 9.3% 打算生育 3 个及以上, 2.2% 不打算要孩子。按年龄划分, 15~34 岁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76 个, 30~34 岁妇女最高, 为 1.83 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 1.91 和 1.46 个。已婚妇女打算生育 2 个孩子的比例为 53.9%。现有 1 孩的已婚妇女打算生育第 2 个孩子的比例为 27.3% (见表 7)。

表 7 分年龄育龄妇女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布

Table 7 Distribution of Intended Number of Children at Childbearing Age by Age Group

年龄组 (岁)	打算生育子女数(%)					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个)	样本规模(人)
	0	1	2	3	4+		
总计	2.2	31.9	56.6	7.4	1.9	1.75	186677
15~19	7.0	23.8	67.2	1.7	0.3	1.65	18105
20~24	5.1	25.0	66.8	2.9	0.3	1.68	21813
25~29	1.8	25.3	65.7	6.4	0.9	1.80	30686
30~34	1.1	27.5	61.0	8.7	1.7	1.83	29176
35~39	0.8	33.9	53.7	9.2	2.4	1.79	26278
40~44	1.1	41.5	45.1	9.4	3.0	1.73	27445
45~49	7.0	23.8	67.2	1.7	0.3	1.65	33174

资料来源: 同表 1。

3.3 打算再生育的现有 1 孩妇女年龄越大, 时间安排越近

育龄妇女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时间安排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打算在 2018、2019、2020 年和 2020 年以后生育的比例分别为 31.6%、15.6%、6.7% 和 5.6%, 逐年降低。

在现有 1 孩打算再生育的妇女中, 年龄越大, 打算生育 2 孩的时间越近, 打算在 2018 年生育的比例越高。在 20~24 岁现有 1 孩打算再生育的妇女中, 打算在 2018 年生育的比例为 14.0%, 25~29 岁为 22.5%, 30~34 岁为 32.5%, 35~39 岁为 43.0% (见表 8)。

表 8 不同年龄现有 1 孩妇女再生育时间安排

Table 8 Intended Timing of Second Birth for Women Having One Birth by Age Group

年龄组(岁)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以后(%)	没想好(%)	样本规模(人)
总计	28.6	16.8	7.5	6.2	40.8	15112
15~19	15.0	11.7	10.0	30.0	33.3	60
20~24	14.0	18.0	15.1	14.3	38.6	1327
25~29	22.5	19.3	10.1	9.1	39.1	5719
30~34	32.5	19.0	6.2	3.8	38.4	4639
35~39	43.0	11.0	2.5	1.3	42.1	2170
40~44	39.4	7.3	1.1	0.5	51.8	853
45~49	20.6	2.9	0.9	0.3	75.3	344

资料来源: 同表 1。

3.4 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和没人带孩子是不打算再生育的主要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 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 3 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

带孩子”,分别占 77.4%、45.6% 和 33.2%。在不打算生育的首要原因中,“经济负担重”占比最高,为 58.9%;第二位原因中,“没人带孩子”占比最高,为 27.0%;第三位原因中,“养育孩子太费心”占比最高,为 26.6%(见表 9)。

现有 1 孩不打算生育 2 孩的前 3 位原因依次为“经济负担重”、“身体原因”、“没人带孩子”,分别占 69.7%、65.5% 和 38.0%。现有 2 孩不打算生育 3 孩的前 3 位原因同上,分别占 82.9%、46.7% 和 30.1%。

表 9 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

Table 9 Reasons for Not Planning for Another Birth for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原因	首要原因		第二位原因		第三位原因	
	样本规模(人)	比例(%)	样本规模(人)	比例(%)	样本规模(人)	比例(%)
总计	109972	100.0	77129	100.0	57993	100.0
经济负担重	64760	58.9	15919	20.6	4401	7.6
年龄太大	23934	21.8	16367	21.2	9840	17.0
没人带孩子	6391	5.8	20814	27.0	9313	16.1
养育孩子太费心	3738	3.4	10473	13.6	15452	26.6
其他	3579	3.3	764	1.0	464	0.8
夫妻身体原因	2851	2.6	3616	4.7	3920	6.8
自己还没想好	2005	1.8	2261	2.9	4115	7.1
影响个人事业发展	1103	1.0	3858	5.0	5252	9.1
丈夫不想生	823	0.7	1929	2.5	3086	5.3
现有子女不愿意	787	0.7	1128	1.5	2149	3.7

资料来源: 同表 1。

4 育龄妇女避孕方法

当前我国已婚有偶育龄妇女避孕率为 84.7%。在已经采取避孕措施的已婚有偶育龄妇女中,宫内节育器使用比例最高,为 40.3%,避孕套占第二位,为 29.6%,绝育使用比例为 23.5%,皮下埋植为 0.3%,口服及注射避孕药为 1.4%,外用避孕药为 0.5%,其他方法为 0.4%,传统方法为 4.0%。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短效避孕措施,在 15~29 岁人群中,短效避孕措施的比例为 57.4%;在 30~49 岁人群中,该项比例为 27.8%(见表 10)。

表 10 按年龄组划分的已婚有偶育龄妇女避孕方法构成

Table 10 Contraceptive Methods for Currently Married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by Age Group

年龄组 (岁)	绝育 (%)	宫内 节育器 (%)	皮下埋植 (%)	口服及注射 避孕药 (%)	避孕套 (%)	外用 避孕药 (%)	其他方法 (%)	传统方法 (%)	样本规模 (人)
总计	23.5	40.3	0.3	1.4	29.6	0.5	0.4	4.0	111798
15~29	5.5	29.5	0.1	1.7	54.3	0.7	0.6	7.6	16695
30~49	26.7	42.2	0.3	1.4	25.3	0.4	0.4	3.3	95103

资料来源: 同表 1。

5 生育养育服务

5.1 女职工实际产假平均为 141 天

在各地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产假、配偶护理假成为普惠性规定,均在以前法定产假基础上有所延长。调查显示,最近一年生育的女职工实际产假时间平均为 141 天,其中,私营企业为 127 天。

5.2 免费孕优服务接受率超过 50%,生育保险覆盖率高

最近一年生育的妇女中,51.3%的人免费领取过叶酸,54.5%的人接受过免费孕前优生检查服务。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存在显著差异,户籍人口免费领取过叶酸的比例为 55.0%,享受免费孕前服务检查比例为 58.4%,流动人口相应的比例分别为 31.9% 和 33.8%。

最近一年生育的妇女中,83.5%的人在分娩费用中使用了不同种类的社会医疗保险报销,其中新农合与生育保险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 47.3% 与 16.9%。农业户口女性中,65.2%的人使用新农合报销;非农业户口女性中,使用生育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的比例共为 56.9%。

5.3 3~5 岁幼儿入园率为 80.8%,公立机构供给不足

调查数据显示,0~2 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为 4.8%,入园率为 15.6%;3~5 岁幼儿入园入托率相对较高,其中入园率为 66.8%,入托率为 14.0%。

公立性质托育机构供给不足,0~2 岁入园入托的婴幼儿中,30.3%在公立机构,69.7%在私立机构;3~5 岁入园入托的幼儿中,在公立与私立机构的比例分别为 34.9% 和 65.1%。

6 总结与思考

本文利用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近期的生育状况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1) 2006~2015 年,总和生育率在 1.60 左右。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升高使得 2016 年总和生育率回升至 1.77。(2) 年龄别生育率分布出现了明显右移,反映了生育势能得到有效释放。(3)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生育水平差异逐渐缩小,东北地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长期处于很低水平。(4) 群众的生育意愿偏低,全面两孩政策效果受限。(5) 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和配套措施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妇女职业发展和养育子女的矛盾,但“养育成本偏高”和“无人照看子女”是制约生育的重要因素。

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育养育配套政策乃至不孕不育等因素对生育率变化的影响也相当重要。关于生育水平的未来发展趋势,本文认为,如果不采取更加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在目前的情况下,生育率可能继续有所下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尽可能地为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实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1) 需要构建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各国在鼓励生育上主要采取经济支持、托幼服务、女性就业促进等政策,但政策效果的显现通常有 5~10 年的时滞。因此,从现在起就需要在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事关民生大局的问题上继续进行改革,提高群众的收入水平,降低养育成本,逐步解决“生不起、养不起、不敢生”的现实问题,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逐步提升群众的生育意愿。(2) 需要尽快出台生育支持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宪法和计划生育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与鼓励按政策生育之间要做好衔接,保障群众的生育权益。(3) 需要构建新型生育文化和家庭文化。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加强舆论倡导,营造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生育友好氛围,引导用人单位重视员工家庭生活,培育科学育儿理念。(4) 加强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和政策实施效果的跟踪监测,建立人口监测预警机制,为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提供数据支撑。

- 1 靳永爱. 低生育率陷阱: 理论、事实与启示. 人口研究 2014; 1: 3 – 17
Jin Yong'ai. 2014. Low Fertility Trap: Theories, Facts and Implications. Population Research 1: 3 – 17.
- 2 郭志刚. 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 国际经济评论, 2010; 6: 112 – 126
Guo Zhigang. 2010. China's Low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Risk.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6: 112 – 126.
- 3 郭志刚. 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国际经济评论 2015; 2: 100 – 119
Guo Zhigang. 2015. Aware of China's Low Fertility Tra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 100 – 119.
- 4 郝娟, 邱长溶. 2000 年以来中国城乡生育水平的比较分析. 南方人口 2011; 5: 27 – 33
Hao Juan and Qiu Changrong. 201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 and Rural Fertility in China Since 2000. South China Population 5: 27 – 33.
- 5 崔红艳, 徐岚, 李睿. 对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 人口研究 2013; 1: 10 – 21
Cui Hongyan, Xu Lan and Li Rui. 2013. An Evaluation of Data Accuracy of the 201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1: 10 – 21.
- 6 杨凡, 赵梦晗. 2000 年以来中国生育水平的估计. 人口研究 2013; 2: 54 – 65
Yang Fan and Zhao Menghan. 2013. China's Fertility Level since 2000: A Reestimation. Population Research 2: 54 – 65.
- 7 陈卫. 中国近年来的生育水平估计. 学海 2016; 1: 67 – 75
Chen Wei. 2016. An Assessment of China's Recent Fertility. Academia Bimestrie 1: 67 – 75.
- 8 杨菊华. 论政府在托育服务体系供给侧改革中的职能定位.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 3: 89 – 96
Yang Juhua. 2018.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Childcare System for Children under Age Three.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3: 89 – 96.
- 9 庄亚儿, 杨胜慧, 齐嘉楠, 李伯华, 王志理.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实践与思考. 人口研究 2018; 4: 104 – 112
Zhuang Yaer, Yang Shenghui, Qi Jianan, Li Bohua and Wang Zhili. 2018. 2017 China Fertility Survey: Practice and Reflections. Population Research 4: 104 – 112.

(责任编辑: 宋 严 收稿时间: 2018 – 11)